

心。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活动，争得了国内资产阶级和社会名流的支持；通过开堂放票，招募了两湖和长江一带大量的会党群众，建立了一支拥有数万人的自立军武装，自立军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会党群众。虽然这次起义归于失败，但它的影响却是很大的。

综合上述的不同点，我们就不难看出，康有为发动的保皇运动（包括他直接筹划的两广起兵勤王），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。前者是名副其实的勤王；后者则“虽托名勤王，而志在革命”<sup>①</sup>，是一次企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，建立资产阶级“自立之国的革命尝试”<sup>②</sup>。

## 二、唐才常等联合会党的原因

如上文所述，依靠会党力量进行武装反清，是自立军起义的一个重大特点。为什么唐才常等要依靠会党？他们又何以能联合会党力量呢？我认为，这是多方面原因决定的。

首先是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，或者说是受客观形势所迫。原来，唐才常一伙在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中，也想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，实行救亡图强。但是，戊戌变法的失败，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，“睹朝局之颠倒，痛国事之危殆”，使他们醒悟到，“变之自上”的路已走不通，必须走“变之自下”的道路。唐才常表示“对于满清已有十分之绝望，恨不即时扰乱满清之全局，组织新政府以代之”<sup>③</sup>；决心“树大节，倡大难，行大改革”<sup>④</sup>，并“以革命家自任”，“以颠覆满清”<sup>⑤</sup>。林圭也表示“今日救国，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……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”<sup>⑥</sup>。沈荃则持“唯一之破坏主义”，“决意与才常呼起风云与汉水”<sup>⑦</sup>。总之，他们都想用革命的手段来

① 章炳麟：《稽勋意见书》，见汤志钧编：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，637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7。

② 关于自立军起义的性质，请参见拙文《略论自立军起义的性质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，1984-01-04。

③ 黄中黄：《沈荃》，见《辛亥革命》（一），289页。

④ 《唐才常集》，197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2。

⑤ 张篁溪：《自立会始末记》，见《自立会史料集》，7页。

⑥ 《自立会史料集》，101页。

⑦ 黄中黄：《沈荃》。





推翻清王朝，组织新政府。但是，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目标呢？在当时，单靠他们少数几个激进的知识分子是根本不行的，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还非常弱小。唯一可靠的巨大力量，乃是下层人民群众，特别是当时活跃在长江流域反帝反封建斗争前线的会党群众。可见，唐才常等联合会党力量，乃是他们进行武装反清的最终抉择。时人评论说，“自立会意在改换中国政府以图自强，只因兵力过单，不得不借会匪之力”<sup>①</sup>，这是符合实际的。

其次，会党发展的规模及其在斗争中显示的力量，也吸引着唐才常等决意去联合他们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，中国的会党势力有很大的发展，特别是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猛然勃兴。它的势力已从长江上游的川黔山区，蔓延到长江下游的江浙沿海。从城市到乡村，从交通码头到驻军兵营，到处都有它的山堂。每个山堂的人数，“多则数万，少则数千”<sup>②</sup>。据清朝地方官的报告和外国侦探的调查，19世纪末，长江流域的会党势力已明显地向商业城镇集中。不仅沿江之汉口、九江、安庆、芜湖、南京、镇江等城市已成为会党活动的中心，就连湖南之常德，湖北之沙市、樊城、老河口，也都充塞着秘密会党。<sup>③</sup>甚至像安徽大通附近长江水道上的小小和悦洲（俗呼荷叶洲）地方，亦会党成群，“溷迹其间”<sup>④</sup>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不是由于中国的“商业革命”<sup>⑤</sup>，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，特别是对长江流域的掠夺，造成千百万城乡劳动者破产失业的结果。因此，这一时期长江会党斗争的锋芒，也就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。反对外国轮船航行长江内河、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等群众性的斗争，在这一带连续不断地发生。1891年长江流域反教会侵略的斗争风暴，席卷了沿江五省数十个城镇；1899年，湖北一省就发生了10次群众反抗起义。<sup>⑥</sup>这些斗争，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统治者。

① 《鄂中诛乱记》七，见《觉迷要录》卷4，50页。

② 《张文襄公全集》卷116，《公牍三十一》，40页。

③ 清方奏报，参见《刘坤一遗集·奏疏》卷2、28；日本侦探吉福奥四郎的调查，参见周锡瑞著、杨慎之译：《改良与革命》，25、317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2。

④ 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，总第292页。

⑤ 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近代城市流氓无产者失业群的大量出现，归结于中国的“商业革命”，我以为是不恰当的。

⑥ 《北华捷报》，1899-01-30、03-13、03-27、04-03、04-10、05-01、07-07、08-07、09-17、10-09，1900-01-05。



长江会党势力的迅猛发展，及其在斗争中所显示的力量，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各派力量的关注。1899年春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就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，偕日本友人平山周，赴湖南、湖北调查和联络哥老会。毕永年化装成和尚，先到汉口邀请了唐才常的同伙林圭，三人一起入湘，遍游长沙、浏阳、衡州各地，所到之处，多劝说哥老会领袖与兴中会合作。<sup>①</sup> 根据这次实地调查，平山周回到日本，即向东京的《东亚时论报》发表了长篇观感。同年三月二十一日（1899年4月30日），澳门的《知新报》也以《湖南现状》为标题加以转载。平山周在这篇观感中，着重叙述了哥老会的状况。其要点是：（1）“湖南夙为哥老会之巢窟，其会员约十二万，会员中多有兵士，又间有高等武官，以阴成其大势力。据闻支那十八省中，殆无地不有其会员，合之约有二百万云。彼等一意以扑朝廷为宗旨，惟彼中之人，其通达世界之大势者极少，然亦非无备高等知识者。其动为毁教堂杀洋人等暴举，毕竟以苦其地方官，因以苦其朝廷耳，决非可与一派之顽固守旧党同视。其组织之整然，实有可惊者。”（2）“各地蜂起之暴徒，大抵不堪穷苦，思至大乱。然以予所观，暴徒无人才无兵器，官兵虽弱，犹足败其无规律无兵器乌合之众，故彼等不久必归镇静。然一时镇静而已，决非全可平定者，盖其秘密会党，星罗棋布。……目下才保平和之体面者，尚无大变可乘，故会党不奋起耳。然湖南之哥老会，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力也。”（3）“湖南为革命派有哥老会，为革新派有南学会，比诸各省，其足以自力，不至受欧人之践踩而有余。”<sup>②</sup> 平山周对湖南哥老会的评论，基本上也反映了毕永年和林圭的看法。毕永年和林圭返回日本以后，还分别向孙中山和唐才常做了汇报。他们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，但从毕永年向孙中山报告后，平山说“所见哥老会各龙头，多沉毅可用；永年所报告金符事实”<sup>③</sup> 这段话，即可推测，他们是积极主张利用哥老会力量发动反清起义的。孙中山根据他们的报告，就决定在湘、鄂、粤同时大举。<sup>④</sup> 唐才常根据林圭的报告，便与林圭、秦力山、吴禄贞等，“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

<sup>①</sup> 林圭在《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筹划起义书》中说：“安兄（毕永年）会中峰（孙中山）于东而议定，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，乃三人同入湘至衡，由衡返汉。其中入湘三度，乃得与群兄定约。”即就此而言。见《自立会史料集》，322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湖南现状》，载《知新报》，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。此件由中山大学历史系谭棣华同志代抄自广州中山图书馆，谨此表示感谢。

<sup>③④</sup> 参见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初集，74页。